

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的共生和失衡

——湖南左翼作家群创作的整体透视与评价

邓 政^①

(邵阳学院 中文系,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 审视湖南左翼作家群的创作, 从总体上看, 作家们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社会政治斗争中开拓了视野, 扩大了题材, 最大限度实践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战斗功能。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语境下, 他们的创作淡化了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

关键词: 湖南作家群; 左翼文学; 政治理性; 审美意识

“政治与艺术双重旋律的交织, 是公认的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1] 凸显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强调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是社会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这是 30 年代建立的革命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2] 无疑, 文学表现时代, 文学为政治服务也就成了此时期左翼作家的共识。有着关注现实和社会人生, 匡时济世、介入时政, 以文救世意识的湘籍文人大多具有“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创作意识。对于深受近世湖湘文化和俄苏文学影响的湖南左翼作家们来说, 同其它地域的左翼作家相比较, 他们几乎都把政治置于自己人生价值的首要位置, 在政治化倾向上可能会表现得更突出一些。政治是他们文学的主宰, 也是他们人生命运的牵引之神。他们选择了“战斗的力的美学”这一审美特性来完成他们的“政治——文学”这一创作理念, 将政治通过文学这一载体传达给世人, 在浓重的白色恐怖里, 以笔为枪自觉而勇敢地在精神领域给了反动派以重重的一击, 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 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的共生

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的强化, 使湖南左翼作家在逼近现实、逼近革命, 反映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动方面, 取得了别地作家无可替代的贡献。黎锦明的《尘影》, 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熊履堂, 国民革命中

反动军官蒯得霖, 革命队伍中的投机政客马润祥、韩秉献, 国民党中的“清党派”何委员以及土豪劣绅刘百岁、刘万发等形象。小说中很多人物是“五四”新文学人物画廊里第一次出现的。小说反映了革命阵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 揭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黎锦明刚写完后就交给开明书店出版, 时任书店编辑的叶圣陶认为在当时白色恐怖气氛十分浓重的时候, 这种题材对当时南京新政府刺激性太大, 因而极其危险, 书店老板不敢贸然出版。周作人看了之后也是这个意见, 最后在鲁迅的鼓舞和帮助下作品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这种对社会现实深刻而大胆的披露, 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浓重的情况, 只能出现在对革命有着直接感知的湖南作家笔下。黎锦明的另一短篇小说《我的口供》的战斗风格更为鲜明。作者借主人公之口, 对当时南京政府所鼓噪的“国民革命成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我说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变样, 就譬之这一回的革命罢。原来‘革命’这字的意义无非是所谓下流社会反抗上流社会, 或被压迫社会反抗压迫社会, 而弄到中国来却变成一种恰恰相反的情形了。他们那些大商贾, 大官僚合起那些以洋房西餐过活的知识阶级, 屠杀了许多农工、学生, 便就是‘革命’将告成功了, 世界上那有这样滑稽可笑的事?”^[3] 另一位左翼作家彭家煌, 也在小说中借一位国民党伤兵之口说出: “……革命革命, 革来革去, 没有革出什么, 只是反而多革出一些贫民, 一些残废。成功, 成功,

① 收稿日期: 2008-04-07

作者简介: 邓 政, 男, 湖南武冈人, 邵阳学院中文系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却只看见一两个人成功,象大多数的无量数的我们这样的人,是永远失败着……革命究竟成功了吗?我们究竟真正革了命吗?说是为民众解除痛苦,民众的痛苦解除了吗?你们也是民众,你们的痛苦解除了吗?”(《垃圾》)^[4]敢于这样直斥反动当局的本质,这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浓重的情况下实属罕见。作者怀着强烈的革命义愤,表达了革命年代人民共同的心声,这是身处革命斗争旋涡中心的湖南左翼作家的深切心理体验,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情绪、意志和愿望。

出于强烈的政治要求,湖南左翼作家从时代视角切入,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示了革命的必然性,预示了革命的前景,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蒋牧良是一个忠于时代的‘战斗作家’”。^[5]《铤砂》就是当时文坛上少见的反映产业工人苦难生活与反抗精神的佳作。《强行军》中描写了伪军的故事,然而却处处突出了红军的巨大力量。叶紫的湖南农运描写也许是最出色的。大革命和农民运动在农民心头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以江西苏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又为农民树立了榜样。这是叶紫在《丰收》和《火》等作品中要表达的重要意思。青年农民立秋在严重的“天灾”和“人祸”面前,“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盼望着“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哟!”“假如要再来一个的话,一定硬要把它弄得久长一些啊!”叶紫的作品在中国最黑暗年代里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乐观的精神,似黑夜中的一团烈火,鼓舞着重压下的人民群众去摧毁旧世界。叶紫在作品中不把农民运动当成单纯的偶发的孤立的事件来表现,而是着眼于揭示引起这些事件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广泛的现实因素,从整个历史联系来说明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是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就反映出时代的本质和历史的必然性而言,叶紫的作品显然比同时代同类题材的作品显示出更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此种倾向的表达,也提供了更多的现实依据。

体现政治化倾向的创作在三位女左翼作家作品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与成就。一生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丁玲,在每一个时期,都能自觉地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新气息、新变化,用政治家的眼光和人格去审视轰轰烈烈的时代和斗争,不断演绎作家对政治的忠诚信仰与理想化追寻。其在左联时期的创作,显然拓宽了思路,视角伸展得相当广泛:《水》写 1931 年波及全国十六个省的洪

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及当权者所制造的人祸,《某夜》塑造了一个在蒋介石屠刀下英勇就义的革命者形象,《夜会》抒写了工人群众纪念“九·一八”的爱国热情,《奔》记录了乡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借债作盘缠奔到上海而希望被撞得粉碎的惨状,《消息》中让渴求革命的人们听到了从另一个世界——革命根据地所带来的消息。读这一系列作品,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看到刀光与剑影,遍地的饿殍,涂炭的生灵,革命者殷红的血……会更加鼓舞起民众的斗志,激励人们勇敢地投入战斗。无怪乎毛泽东对其有“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赞誉。由此可以看出丁玲手中这支笔的威力。谢冰莹的作品有一种阳刚之美,字里行间充溢着雄浑奔放、高昂激烈之气。试看她笔下的句子:“奋勇地冲上前去,和敌人作一次最后的斗争!”(《地狱中的天堂》)“假若此时我握着手枪在手里,第一颗子弹一定落在那混帐王八的水手的脑上”(《海上孤鸿》)如此痛快淋漓的情绪宣泄,读来令人神往。曾被阿英誉为当时女性作家中“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反抗精神方面,在革命情绪方面”“最发展的一个”的白薇,创作《革命神受难》对屠杀人民、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进作了彻底揭露,致使发表它的《语丝》杂志社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警告。“九·一八”事变前后,她又将笔墨移向反日斗争,传达出东北人民的抗日呼声,同样显示出其创作与时代俱进的走向。

二 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的失衡

政治意识对文学创作毕竟是一柄双刃剑。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阶级利益高于一切,阶级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文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艺术’”^[6]这个语境下,湖南左翼作家们在最大限度上实践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战斗功能,可是这种对文学功能的激进选择,却挤压了文学的审美创造空间,抑制了文学自身内部的美学建构,淡化了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弱化了文学创作的自律意识,使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意识的传声筒。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尚质轻文,忽视了“文学技巧”的表达,人物描写缺乏典型性。诸如《尘影》中的熊履堂表现出来的更像一个热心社会改革、秉公办事、体恤民情的传统型“父母官”。这是一个道德理想的集合体,一个观念形态的聚合体,而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艺术典型。由于作者“尚质轻文”的创作意识,导致对人物性格疏于典型化,而没有刻划出一个政

治家应有的能力、智慧、胆识和个性。在这个人物身上,更多的是集中了黎锦明更多的观念化、情绪化的东西,而丧失了构成一个艺术典型必须具备的某些更为细腻、更为生动合理的元素。蒋牧良的小说,其内容之厚重是著名的,但弱于技巧的探索也很显然。他急迫地陈述着耳闻目睹的农民生活惨状,因而笔致较为粗糙,叙述多于描写,难于把笔触细致而从容地伸向更深的社会、文化、心理层次。以“女兵”文学著称于世的谢冰莹在此时期的作品中以写实手法反映了革命时代的风云和革命激情,不夸张,不渲染,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但纯粹的写实排斥了艺术的虚化,作品虽真则真矣,却缺少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余韵,强调了纪实性,弱化了文学性,使史实价值大于文学价值,正由于艺术技巧方面的粗糙,因而也多少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即使是被阿英称之为“她是现代的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比较最优秀的戏剧作者”的白薇,^[7]也因为此时期在她的戏剧世界里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灌注了强烈反抗激情的世界,难以在审美时保持距离,往往任凭自己的感情奔涌,而无暇或无意对它进行规范和节制,她的表达也是自发的,并非自觉的形式追求,因此她的作品就像是未经雕琢的宝石,虽熠熠闪光却并非完美。

2 生活经验的缺乏导致艺术感染力的缺失。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环境下,尽管湖南左翼作家曾参与过一些革命运动,但却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之中去,同时加之湖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因而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缺乏生活的真实感,有些甚至流于概念化。诸如《战烟》中,尽管其思想是正确的,主题是积极的,但由于作者的材料大都来自当时各种报刊杂志的报道和记载,以及对事件的一般调查、采访,缺乏实地生活经验,所以人物形象比较概念化,情节也欠真实,结构也较为零乱。彭家煌加入“左联”后,由于他并未亲历中国的农民革命斗争,对革命队伍中所发生的事情不甚了解,但在理智上他又想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因而在其《两个灵魂》中,由于缺乏深厚的生活功底使得他在创作中陷入了矛盾境地,理念大于形象。这种观念的绝对化,就导致了完全以想象的逻辑代替艺术形象内在逻辑发展的创作,进而影响了小说创作的深度和厚度。曾被钱杏邨称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九三一年的最优秀的成果”的《水》^[8]同样由于作家的生活和斗争经验的

不足而导致了“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群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造,以站在岸上似的兴奋的热情和赞颂代替了那真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中的痛苦和愤怒的感觉与感情。这样就使我们只能感到作者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而不能借这一幅巨大的群众斗争的油画心惊肉跳地被人民的力量所感动。”^[9]

综观黎锦明、彭家煌、蒋牧良、叶紫、丁玲、谢冰莹、白薇等湖南左翼作家们的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强烈的政治关怀意识,使他们最早将目光和激情投向广阔而剧烈的社会变动,转向民生疾苦,转向阶级斗争,用文学创作和文学行为来思考社会和人生,这使文学创作题材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开拓,表现角度得到了深度开掘。他们从各自的现实体验和感受出发,在政治激情的引导下,在追寻“战斗的力的美”这一审美特性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些既具有深沉的艺术底蕴又具有浓烈的政治激情的作品,引领文坛之风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更促进了左翼文学的繁荣。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语境下,他们的创作挤压了文学的审美空间,淡化了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造成了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的失衡。

参考文献:

- [1] 贾振勇.当审美遭遇政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5).
- [2] 张俊才,李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1.
- [3] 黎锦明.黎锦明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06.
- [4] 严家炎.彭家煌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70.
- [5] 周而复.遥望南天慰忠魂[J].芙蓉,1983(3).
- [6]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7.
- [7] 阿英.论白薇·中国当代女作家[M].上海:上海书局,1985.
- [8] 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J].北斗,1932,2(1).
- [9]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J].中国作家,1948(2).

(责任编辑:黄声波)